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高有鹏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649-3598-6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民间文学—文学史—中国—现代 IV. ①I207.7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9543 号

责任编辑 余建国

责任校对 谢冰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12(高等教育出版分社)

0371-86059713(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郑州市运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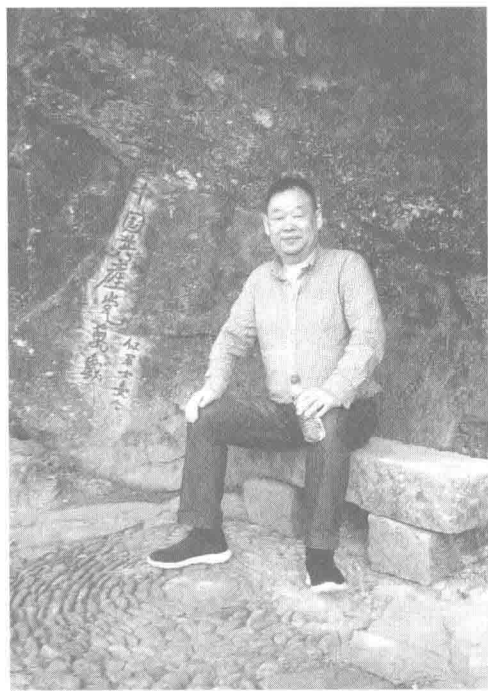
印张 21.5

字数 434 千字

定价 5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高有鹏，河南项城人，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出版学术著作《中国民间文学史》(2001)、《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2004)、《中国民间文学通史》(2012)、《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2015)、《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2015)、《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2018)等，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一二三卷)、《清明上河》、《大宋风月》等，出版书法作品《大篆论语》、《大篆道德经》等。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建立	(1)
一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	(1)
二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	(5)
第二章	五四歌谣学运动	(30)
一	五四歌谣学运动的缘起与方向	(31)
二	歌谣学范式的建立	(35)
三	歌谣的思想文化	(40)
四	拓展与转向	(46)
第三章	现代民俗学运动	(51)
一	北平的余音	(53)
二	东南的风浪:从广州到杭州	(58)
	(一)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58)
	(二)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	(73)
三	文化复兴:中西部民间文学研究	(82)
	(一) 大河上下	(83)
	(二) 复兴的文化主题	(94)
四	《中华全国风俗志》的民间文学史意义	(100)
第四章	乡村教育运动	(106)
一	以“乡村民众”为对象的民间文学调查	(107)
二	《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的民间文学史价值	(113)
三	关于乡村教育运动中的民间文学理论问题	(118)
第五章	《古史辨》学派与现代神话学	(128)
一	《古史辨》神话学派	(128)
二	中国现代神话学	(135)
第六章	红色歌谣	(147)
一	十送郎当红军——中央苏区红色歌谣	(148)

二	八月桂花遍地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	(156)
三	老子本姓天——湘鄂西红色歌谣	(160)
四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陕北民歌与刘志丹	(162)
五	大瑶山民歌	(164)
六	秦巴山民歌	(165)
第七章	“林兰女士”与《民间故事》	(168)
一	“林兰现象”	(168)
二	故事的内容与类型	(172)
三	《民间故事》的故事史价值	(181)
第八章	抗日歌谣与现代民间文学	(184)
一	东北抗日歌谣	(185)
二	晋冀鲁豫抗日歌谣	(189)
三	南方抗日歌谣	(195)
四	大西南的抗战歌声	(203)
第九章	鲁迅的民间文学观	(213)
一	尊重民间与正视现实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	(213)
二	关于民间文学的起源及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223)
三	对民间文学嬗变历史及其价值的文化透视	(236)
四	鲁迅的神话学观	(245)
第十章	胡适的民间文学观	(254)
一	比较歌谣学的创制及其歌谣学思想	(254)
二	关于民间传说故事的研究	(264)
三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问题	(278)
四	《白话文学史》对现代民间文学理论发展的贡献	(285)
第十一章	延安民间文艺运动	(295)
第十二章	民族学为背景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	(302)
一	民族志的意义	(305)
二	边疆建设的文化选择与民间文学问题	(311)
第十三章	中国现代民间歌曲理论	(316)
第十四章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328)

第一章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建立

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无论是其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为文献文本所显示的内容,还是其从学科与学理上探讨所体现出的思想理论内容,都可以把它看做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新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危亡时刻,民间文学成为唤醒民众民族意识、鼓舞民族斗志的文化利器,它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与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文化自觉,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对社会发展中人民大众思想文化诉求的应答。

一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是民间文学自身的发展,既有对传统民间文学类型的接着讲与照着讲,又有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及时表现,这是其主体;第二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翻译,包括各种形式的介绍、改编;第三是民间文学思想理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三者相互影响作用,尤其是前两个部分常常形成共处于一个民间文化生活整体之中互为的现象,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内容中,有许多就是对当世社会风俗生活的直接体现。

“现代”是一个历史学的时间概念,意在表明距离我们现实最近的一个特殊时间阶段,或者说就是当前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开端,以区别于社会形态的以往历史阶段。而由于传统的划分方式,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分期,我们常常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阶段称为“现代”;1949年之后的历史被称为“当代”,即当下发生的社会历史。其实,民间文学是一条波浪汹涌的大河,泥沙俱下,只能大致划分某一阶段,如果强加给它一定的时间阶段作为其标签,未必不是勉强,或者是削足适履,或者是掩耳盗铃。在历史文化的记忆述说中,许多时候事件作为记忆与

表述的单位意义,应该比具体的时间划分更准确。这就是“模糊美学”叙事价值体现。

民间文学与时代发展同步,及时体现、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状态。但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一样,有时是非常直接具体的表现,有时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色彩,而许多时候并没有什么联系。诸如民间文学的时政歌谣,直接讽刺、批评或歌颂社会现实中的某些典型;有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在讲述中夹杂着时代的影子,留下相应的历史文化痕迹;有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讲述。而且,民间文学在具体流传中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与规律,它常常在一些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对其进行不同形式的评说。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些农民起义,当世未必有多少真正直接体现于民间传说故事,做什么绘声绘色的讲述,而在多少年之后,这些起义的英雄们还被民间百姓所记忆和讲述,而且有许多事件被更加完整地讲述出来。诚然,讲述者与记录者面对这些民间文学的口头文本,讲述与记述的语言与立场常常大不相同,一切讲述与记述都具有鲜明的身份,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权利或文化利益性思想情感内容。这同样属于现代民间文学。不同形式与不同内容的民间文学共融社会生活整体,也如同动植物的生态与时代相联系,共处一片天地,各显本色。但是,从总体上讲,对于那些深刻影响到社会现实发展变化的重大事件,民间文学从来不会无动于衷。在这种意义上讲,民间文学又堪称为时代发展的晴雨表,是社会风俗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映照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明亮的镜子。

对于民间文学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联系而言,我们应该重视其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真实的一方面,但是,决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些内容作为其唯一的价值。其最可贵的价值意义在于其体现最广大人群即民间文学讲述主体的情感与意愿。许多时候,讲述的实际与记录效果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民间文学的讲述与记述在体现历史真实的意义上是不尽相同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民间文学表现大多数人的文化利益,即一定人群之中所具有或表现出的具体的思想情感意愿,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其民间文学形态也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记录民间文学具体内容的人不仅仅是身份不同、立场不同,而且记述能力与记述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所以,形成的民间文学的文本也千差万别。在民间文学史的意义上,无论什么样的文本,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整体而言,民间文学是千百万社会大众的心声,它可能不一定细致地表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而具体的生活,但是它从来不会歪曲现实;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古人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一再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民间文学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对影响民族命运、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什么时候都不会冷漠,但并不是简单、刻板的社会历史发展做所谓“起居注”式的直接记录,其讲述内容常常根据讲述者的具体感受作具体表现与表达。举数影响民族命运、社

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在民间文学的讲述中都有所表现;有一些被记录,证明这些民间文学内容的存在,而由于多种原因,有些内容没有被及时记录,甚至直到多少年之后,有的被不完全记录,有的仍然没有被记录,因此形成了民间文学文本形式与具体流传实际不相符合的现象。而且,在许多时候,民间文学的流传是有选择条件,然后才被认同和表现的。

对于今天流传和被记录的民间文学,我们看到其历史记忆的内容在许多时候被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这一文化主体。我们从现代历史文献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新的民族与国家政权的建立过程的极其不寻常;这是近代历史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争得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第一次取得完全而伟大的胜利。诚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所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以,千百万人民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歌唱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但是,历史的过程是极其曲折和复杂的,也正是这种艰难曲折才更显示共产党与各种正义力量的坚强不屈;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0年代的初期,当时还十分弱小,只有人数不多的党员,中国社会并没有在它一开始就完全接受它和它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它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与其说它领导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更应该说是它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民间文学代表了历史的良心,接受了这种历史事实,及时表现了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土地革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新四军、延安革命根据地,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彻底打败中国国民党及其率领的数百万大军。这些内容无一遗漏被民间文学所讲述,与历史上流传的政权建立故事一样,民间文学并不是像教科书那样照本宣科,逐条解说,而是常常选取其中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将其“神话化”、“箭垛化”,诸如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许世友武艺高强等传奇故事成为这些历史事件被传说的表现。与此类似的是那些时政歌谣,诸如秋收起义对毛泽东的歌颂,表现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打土豪分田地,充满喜悦,他们未必明白多少高深的道理,而是更感激他们熟悉的“毛委员”;鄂豫皖苏区流行《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红色歌谣,他们未必懂得什么叫左倾右倾,他们面对的是“鲜红的旗帜飘起来”,是“红军干部好作风”,更多表达拥护“扩红”、“拥红”,表现出对红军的热爱和对革命的无限热情。抗日战争时期流行的歌谣更是这样,人们痛心东三省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和东北军的不抵抗,到处传唱着不当亡国奴的歌谣,传唱着救国家救民族的抗日歌谣,歌唱抗日英雄,在中国每一片土地上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浪潮。与此相比的是在知书达礼的一群人中间流行着他们无耻的“汉奸文学”,他们极力散布不抵抗主义。这更显示出“不识字”的民间文学主体所具有的良心与使命。历史的记忆与认同是一个文化选择与建构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忘却或淡化、或强化那些事件,以此在

重复中形成民间文学世界自己的秩序与情感;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在讲述这些传说故事和歌谣,甚至不同程度忘记或淡化了某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这是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重要规律。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党派之争,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与异同,及其在民间文学中的表现。许多文学史回避这个问题。应该看到,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爱与恨是可以转化的,民间文学的不确定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如当年军阀混战时期,北伐代表着时代的意志,有许多北伐英雄如叶挺被神话化,此时的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未必被民众所辱骂;或者说,直到抗日战争初期,尽管其曾经有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与进步力量的恶行,全社会仍然把蒋介石视作全民抗战的领袖,在民间歌谣、民间歌曲中不乏对他的颂扬。但是,社会风云变幻无常,历史发展充满许多更复杂的因素,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军队,虽然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打出了台儿庄战役、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等那样被全民族热烈歌颂的壮举,但是,他们最终走向人民大众的反面。尤其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严重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日益反动,其愈演愈烈的腐败、贪污,鲜廉寡耻,草菅人命,民不聊生,独裁专制,甚至疯狂镇压提出正当诉求的民众,无情打击迫害扼杀民主与自由,罪恶滔天!其完全失去社会公信力,最终失去人民大众的信任,必然为时代所抛弃。民间文学以民间歌谣中歌唱“想中央(军),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出现把蒋介石骂作“蒋该死”;与当年张宗昌祸害山东时,人们歌唱“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张宗昌);也有葱,也有姜,锅里煮着张宗昌”的歌谣是一样的道理。凡是独裁专制、祸国殃民之徒,无论其权势熏天,或者是如何耀武扬威,都逃脱不了人民的辱骂和历史的唾弃!笔者曾经考察民国时期的土匪,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曾经是受到饥寒压迫的穷苦人,也曾经劫富济贫,甚至在民族危亡关头,能够不怕牺牲,敢于抗日,但是,在其人生遇到艰难险阻时,又经受不住物质与精神的诱惑,最后反过来欺压民众,丧尽天良。一个人未必生下来就恶贯满盈,但是,所有的罪恶都会付出代价。民间文学以种种形式鞭挞这些残害人民、危害社会的行为,以时政歌谣、政治笑话等形式讽刺、谩骂,这是民众思想情感最真实而热烈的表达和倾诉。同样,民间文学更多表现出对正义力量的颂扬,如其对当年冯玉祥亲民爱民为民等行为的歌颂等现象。民间文学歌颂光明,鄙视邪恶,在政治笑话与生活故事中对韩复榘军阀作风的嘲笑讽刺,对各地大小贪官污吏祸害天下行为的揭露与痛骂,都是发自肺腑,表达出的义愤。民间文学体现民心所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振木铎以求歌谣,观政治得失,形成问政于民的良好文化传统。现代社会同样如此;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解放区文艺运动中提倡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出现陕北民歌的大流行。陕北民间歌曲《东方红》歌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典型,与痛骂蒋介石的“五大天地”等歌谣形成天地之间的差别。因此,中国

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价值,它用最直接最简朴的语言给世人一直重复讲述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与事实,也用同样的语言告诫世人要尊重民众,以历史上那些民贼为戒,以那些臭名昭著的失政者、亡国者为鉴。或曰,殷纣王确实在统一国家民族中具有巨大历史功勋,而民间文学讲述的却是一个横征暴敛、酒池肉林、荒淫无度的历史罪人。应该说,这就是民间文学最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虽然在时间上只有三十年,但它处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开端,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彻底结束之后,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西学自近代社会融入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充注思想生机,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文学思想家、理论家、翻译家与搜集整理的热潮,并形成以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但是,这并不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历史的全部内容;民间文学具有历史传承性,虽然它会因为新的社会历史阶段而体现出社会现实性内容,而在总体上仍然具有传统的内容与特征。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有三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其一是最直接的背景,即域外文化的影响,主要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迫使传统文化格局发生变化;其二是近代文化思潮,即明代中后期就已经形成的求新求变,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潮流,促进了学术发展中的民本意识;其三是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寻求,即“礼失求诸野”的文化规律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基本内容相融合,就自然形成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式的基础。

在这三个背景中,域外文化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因素。应该说,没有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人类文明的进程就会停滞,甚至会发生倒退;我们中华民族壮大和发展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昔司马迁曾说过,三代之居皆在于河洛之间。三代,就是传说中的帝王,他们其实也都是不同国家的或民族的首领,通过文化较量,当然也有各种斗争,分别在河洛地望取得统治权利。所以古人也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另外,我们从中华民族的始祖神黄帝的图腾构成上也可看到,正是民族或部落间的融合,形成民族或部落的迅速发展,其中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文化交融所形成的向心力、凝聚力。世界各民族的标志,其主要内容便是文化;美国自1776年建立独立的国家,独立战争中形成的文化精神,对自由、民主、平等等文化理念的追求,形成极重要的民族精神,甚至影响到世界的发展;至今,它却以另一种姿态形成霸权,而且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培养了许多无限忠诚于他们的孝子贤孙。自然,文化间的交流,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从来都是具体到不同民族的各种利益追求与选择的内容,不平

等的因素常常占据大多数。中国近代化的构成,包括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就是鸦片战争的结果;在更重要的程度上是民族内部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无官不贪,个个色厉内荏、懦弱无能而又鲜廉寡耻,形成社会文化良心普遍极度缺失,社会正义荡然无存,人们对统治阶层完全失去信心,才转而向异域文化求取生存和发展的经验与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文化就是罂粟之花,充满悲壮的美丽。我们检索历史,可以深切感受到林则徐、龚自珍他们的愤恨中包含着深广的民族精神,而其中包含着非常突出的对异域文明的强烈排斥,因为异域文明固然有现代成分,但也不乏甚至更多的是罪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选择了接受异域的文明和文化,虽然这和历史上对西域的寻求在感情上有着巨大差别。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精神,如面向民间的启蒙、融入民众的文化追寻,及对民主、科学的宣传与实践,都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格局,充满了不情愿的因素,但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回首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如果没有蒋观云、周作人他们的对西方民间文学理论概念的译入,我们的这个体系很可能没有那些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理论,或者仍然作为传统学术方式,不能如此迅速融入现代思想文化之中。当然,过分夸大域外文明的主导作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食洋不化与食古不化都属于机械主义。

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西方民间文学理论的传入,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周作人时代,主要从日本移入,梁启超他们要强国,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中得到深刻启发,他们强调“新民”,尤其是鲁迅他们寻求与传统不合拍的“恶声”,是不自觉的文化选择。第二个阶段便是江绍原和郑振铎时代,他们有了较为自觉的意识,认识到西方民间文学理论包括相关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时期的成就尤为突出,诸如黄石、谢六逸他们,对于西方神话学的译介,使得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获得成熟发展的内容。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前后,更年轻的一批学者,诸如岑家梧、芮逸夫等学者,他们更多的译入了与民间文学理论相关的图腾理论、民族学和语言学理论,使现代民间文学理论有了更充足的发展。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至关重要。正是集中在这一阶段的理论翻译,构成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式,形成其基本框架。这三个阶段的翻译对象也各有侧重,第一个阶段重在从日本译入,第二个阶段重在从法国、英国即欧洲地区译入,第三个阶段则重在从美国译入。这三个阶段的三个地区,在文化构成与发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按一般的道理讲,日本文化更多的是作为中西文化的驿站;而欧洲学者更多的是理性批判,是历史研究,诸如泰勒的(Tylore)“遗留物说”、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的“比较神话学”、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人类学派神话

学”和杰·弗雷泽(J. Frazer)的“巫术理论”,关注较多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传承与变异;美国文化更多的是经验主义,追求实证。

总之,不同的文化风格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学术方式和学术风度,从而也影响到译入区域的学术发展。

第二个背景即近代文化思潮,若追溯其源头,应该是明代中后期就蕴含或孕育着这种具有批判和启蒙意义的文化思想了。这就是从冯梦龙到戴东原,再到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他们,构成一条思想文化的大河;他们的学术思想最突出的品格就是对传统与时代所表现的批判与叛逆,敢于冲破已经腐朽到极点却越来越顽固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近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发展内容,已经有学者做出整理性的工作。如阿英对相关资料的钩沉与挖掘,钟敬文对改良派、革命派的民间文学理论的透视与勾勒、梳理,张振犁对顽固派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①。近代民间文学理论作为庞大的文化思想体系,其内容尤其复杂;在前面相应的章节中,笔者已经做了论说。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鲁迅他们的早期的民间文学思想,包括章太炎的《廛书》等文献,尤其是小说、诗歌、戏剧的改良和教科书重制等文化现象,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族主义,如何更深入地探索这些内容,确实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的再认识的关键。特别是近代哲学思潮的意义,尤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个背景其实就是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自觉的民本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礼失求诸野”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规律。所谓“礼”,其实就是主流文化;所谓“野”,其实就是民间文化,自然包含民间文学。我们常常把儒家文化作为文化主体,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个人责任和使命。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郑振铎说民间文学就是大众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②,这固然有他的偏颇,但无视民间文学为全民所拥有的历史存在事实,这是更大的偏颇。应该看到,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语言的艺术形式,而且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离开了生活的实质意义,就难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真正面目。正因如此,如人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绿,所以,作为主流文化的“礼”就能从作为民间文化的“野”中汲取到源源不断的汁液,促使其自身的健康发展。如孟子所强调的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在事实上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加上更为古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自觉性就有了更特殊的价值和意义。鸟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学的每一次革新几乎都与民间这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的体系构成中,传统的文化精神得到充分的张扬,这就是这种文化规律的延续。若没有这种

^① 见阿英系列著作;钟敬文与张振犁文章见《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内容及文化精神的贯彻,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将是空中楼阁,或沦为一种殖民话语。也正因为有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化精神的巨大支持,这个体系才能扎根于中国社会,并在现代历史发展中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缕火花,照亮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前程。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对于今天民间文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正因为受到不同学科知识与思想理论的影响,“民间文学”的学科概念在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具体建构过程中形成。

或曰,“民间”这个概念和“文学”这个概念,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都早有存在。但是,“民间文学”这个概念出现其实并不是很早,而至于1920年代之前,似乎没有出现于报端。如胡适回忆与朋友的来往经历时所说:“1916年3月间,我曾写信给梅觐庄,略说我的新见解,指出宋元的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觐庄究竟是研究过西洋文学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赞成我的意见。他说: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聩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这封信真叫我高兴,梅觐庄也成了‘我辈’了!”^①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梅光迪第一个使用“民间文学”这个概念的根据。但是,这里胡适以信件述说并证明“民间文学”的概念,到底不是直接的证据。如果考察民间文学作为学科的概念出现,则应该始自胡愈之的著述中。

胡愈之是曾经被我们忽视过其重要贡献的文化巨人。

胡愈之是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也是一个作家(其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可谓最早的科学幻想小说),是杰出的文化战士,他早年受过扎实的古文训练,并有在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学习的经历;其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自学英语、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1915年起,做《东方杂志》编辑,其非常勤奋,阅读到许多西方图书报纸;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曾经参与过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与茅盾、郑振铎等人一起组织成立文学研究会。其视野非常开阔,所以能够迅速感受到新文化与民间大众的特殊联系,而及时提出“民间文学”这个重要的学科概念。

^①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原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

《妇女杂志》创刊于1915年^①,1931年12月停刊;其提出办刊思路为“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之法尤为注意,既足为一般贤母良妻之模范童蒙养正,又为研究教育者所必当参考之书”,其提出“改良家庭即整顿社会”等主张。《妇女杂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始由王蕤农主编,自第七卷第一期即第七卷到第十一卷由章锡琛主编;此后还有杜就田、叶圣陶、杨润馥等人做主编。胡愈之是这份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他的《论民间文学》发表于《妇女杂志》1921年1月即第七卷第一期,这时的杂志主编是刚刚上任的章锡琛。胡愈之谈论民间文学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扎实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基础,而且是持之以恒的。1930年代,他发表《关于大众语文》提出“‘大众语’应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文一定是接近口语的”^②,表达出同样的看法。

胡愈之在《论民间文学》中系统论述了民间文学的各个方面内容与特征,以及价值意义。他开篇即说“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其范畴在于“像那些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等”^③,都是民间文学。

在与作家文学的比较中,他强调“民间文学”所具有的“两个特质”,其论述道:

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普通的文学著作,都是从个人创作出来的,每一种著作,都有一个作家。民间文学可是不然,创作的决不是甲,也不是乙,乃是民族的全体。老农所讲的故事,婴儿所唱的乳歌,真实的创作家是谁,恐怕谁也说不出。有许多故事歌谣,最初发生的时候,也许是先有一个创意的人,但形式和字句却必经过许多的自然修正,才能流行民间;因为任凭你是个了不得的天才,个人的作品,断不能使无智识的社会永久传诵的。个人的作品,传到妇女儿童的口里,不免逐渐蜕变,到了最后,便会把作品中的作者个性完全消失,所表现的只是民族共通的

① 1915年是许多重要报纸杂志创办的时间,如胡晓明在《近代上海诗歌系年初编(1898—1919)》中统计显示:1月1日,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海》创刊。5日,商务印书馆创办《妇女杂志》月刊,后又创办《英文杂志》月刊。20日,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创刊。本月,《科学》杂志创刊,中国科学社主编,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本月,《小说海》、《妇女杂志》、《中华学生界》等月刊创刊。2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11月创刊《中华医学》杂志。3月,《双星》、《戏剧丛报》、《小说新报》、《消闲钟》等月刊创刊。5月,《中国白话报》创刊。6月8日,内务部电令查禁《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等上海报刊。8月1日,包笑天主编的《小说大观》季刊创刊。5日,《日本潮》创刊,由群益书社编辑发行。15日,《国货月报》创刊,该刊“以发达工商,提倡国货”为宗旨。31日,李辛白主编《通俗杂志》半月刊创刊。9月10日,《亚细亚日报》、《中华国货月报》创刊。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2卷1期起改名《新青年》)创刊。10月1日,《中华新报》杂志创刊。10日,《中华新报》创刊,谷钟秀、杨永泰等主编。11月,《大夏丛刊》月刊创刊。12月25日,《民俗日报》创刊。本月,《复旦杂志》月刊创刊。

② 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独立评论》1934年第109期。

③ 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1月。

思想和情感了。所以个人创意的作品,待变成了民间文学,中间必经过无量数人的修改;换言之,仍旧是全民族的作品,不是个人的作品了。

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 Literature),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 Literature),书本的文学是固定的,作品完成之后,便难变易。民间文学可是不然:因为故事歌谣的流行,全仗口头的传述,所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经过几度的传述,往往跟着时代地点而生变易;所以同是一段故事,或一首歌谣,甲地所讲的和乙地不同,几十年前所讲的又和几十年后不同。这也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征。

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一个是成文的,一个却是口述的不成文的^①。

这是最早系统论述民间文学特征的文献。从其理论来源看,确实是与西方学者的民间文学论述有关,但他没有任何摘抄搬用的痕迹。应该说,胡愈之完成了关于中国民间文学概念和特征阐释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

其学术视野尤其宽广,如其所论述民间文学的艺术发生及其教育功能,他更早注意到民间文学中“研究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或比较宗教学的都不可不拿民间文学做研究的资料”这样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如其所说:

从艺术的本质来看,文学的发生,是由于原始人类的艺术冲动(Art-impulse)。表现这一种艺术冲动的,在野蛮人类是跳舞、神话、歌谣等等。这种故事、歌曲,虽然形式是很简陋的,思想是很单纯的,但也一样能够表现自然,抒写感情。而且民间文学更具极大的普遍性。又因为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是耳的文学,不是目的文学,所以在有韵的民间歌谣中,往往具有很自然的谐律(rhythm)。有许多歌谣当中的音律,决不是文学作家所能推敲出来的。再从心理上看来,民间文学是表现民族思想感情的东西,而且又是表现“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的最好的东西。因为个人的文学作品,往往加入技巧的制作和文字形式的拘束,所以不能把人的思想感情很确切很真率的表现出来。只有民间文学乃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流露出来的是民族共通的思想感情,不是个人的思想感情。所以研究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或比较宗教学的都不可不拿民间文学做研究的资料。再从教育上看来,民间文学是原始人类的本能的产物,和儿童性情最合,所以又是最好的儿童文学^②。

胡愈之更看重“中国民族在世界上占有特殊的位置”的命题,并以此论述“中国的民间风俗”与“民间文艺”,其“当然是极有研究的价值”。他进而论述道:“可是中国的故事歌谣,却从来没有人采集过;虽有几个外国人的著作,但是其中所收的,也不过是断片的材料罢了。”所以,他提出“现在要建立我国国民文学”,其所说“国民文学”,应该

① 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1月。

② 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1月。

是指现在所说的“民族文学”，其基本任务在于“研究我国国民性，自然应该把各地的民间文学，大规模的采集下来，用科学方法，整理一番”。也正如他所担忧的“我国地大人多，交通又不便，各省的民风，各各不同，所以要下手研究，恐怕没有像别国的容易”。至此，他提出学术合作，即“我国也设起许多民情学会，民间文学研究会”，“许多人合力做去才好啊！”^①或曰，胡愈之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第一个倡议成立“民间文学研究会”的学者。

关于“研究民间文学应该分两个阶段”，其实是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他提出“最先把各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歌谣采集下来，编成民间故事集、歌谣集等”，然后是“把这种资料，用归纳的分类的方法，编成总合的著作”。所谓“总合的著作”，他举例介绍，称“要算佛赖瑞博士(Dr. J. G. Frazer)的《金枝集》(Golden Bough)，哈德兰(E. S. Hartland)的 Legend of Perseus 最为著名”，同时，他又指出“但现在研究我国民间文学，还没有现成的研究资料，所以应该从采集入手”，他的许多论点与歌谣研究会的学者思想理论是相同的。如他指出“采集民间文学有几桩事情应该注意”，即：“下手时候应该先研究语学(Philology)和各地的方言”，“因为不懂得语学和方言，对于民间文学的真趣，往往不容易领会”。这与歌谣学运动中的方言调查颇为相似。他指出“用文字表现民间的作品，很不容易，因为文字是固定的，板滞的，语言却是流动的；最好是用简单的辞句，把作品老老实实在表现出来，切不可加入主观的辞句，和艺术的制作”，“像丹麦安徒生(Christian Andersen)那种文体最为合适”，与歌谣学运动所提注音注释等主张相似。其指出“采集的时候，应该留心辨别，到底所采的故事或歌谣，是不是真正的民间作品”，“因为有许多故事或民歌，也许是好事的文人造作出来的，而且造作得未久，还没有变成民族的文学，所以不应该采集进去”，是强调民间文学的选择与认同，与歌谣学运动中研究“猥亵的歌谣”在思想理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最后指出“民间作品的价值，在于永久和普遍”，“流行的年代最久而且流行的地方最广的，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所以“采集的时候最应该注意”^②等理论，无论是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的方法还是境界，都远远超越了同时代许多学者。

同时，胡愈之在《文学旬刊》上相继发表了《研究民间传说歌谣的必要》^③和《童话与神异的故事》^④等民间文学理论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民间歌谣与民间故事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等问题。此后，他发表《关于大众语文》等文章；在流亡法国时，他又

① 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1月。

② 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1月。

③ 胡愈之：《研究民间传说歌谣的必要》，《文学旬刊》1921年6月20日

④ 胡愈之：《童话与神异的故事》，《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